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中华之魂

摇篮曲

中 华 之 魂

——摇篮曲

(下)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97 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审定
中小学图书馆必备书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摇篮曲/中华之魂丛书编委会编. —2版.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1997. 7
(中华之魂丛书)
ISBN 7-80078-230-1

I. 摇… II. 中…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462 号

中华之魂——摇篮曲(下)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交民巷 23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25 印张 344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2 版 1998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18000—28000 册

ISBN 7-80078-230-1/K·10

定价:86.50 元/套(5.76 元/册)

目 录

怀念刘子毅	李 纳 (276)
但闻延河流水声声唤	欧阳代娜 (279)
情系黄土地	李 伦 (286)
一段意外的经历	刘幼雪 (292)
从延河走过来的	
——甜甜的回忆	李骏 口述 王桂 执笔 (296)
我和伤病员情同手足	高耶夫 (307)
北斗七星高	安 琪 (325)
那过去了的，终将变成亲切的回忆	
——桥儿沟的欢乐	易达美 (329)
青春无悔	苏 红 (335)
从戚元靖帮我学英语谈起	牛旭光 (341)
永恒的怀念	力 贞 (345)
同窗情	刘 凯 (353)
行 军	杨廷藩 (358)
育苗篇	刘彤矢 (368)
后 记	编委会 (412)

怀念刘子毅

李 纳

我和刘子毅的关系，与其说是师生，还不如说是朋友。想到他的死，悲愤压痛我的心。他是烈士的遗孤，没有死于敌我厮杀的战场，而死于江青等设置的酷刑。其“罪名”，仅为他的继母是贺子珍的妹妹。

我和刘子毅相识于1943年末，那时，我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调到延安中学教语文，并兼班主任。说实话，教语文已够我吃力的了，当班主任，更使我如负重荷，终日喘不上气来。孩子们大约在14至16岁之间，其中有几个大的，年龄与我相仿，刘子毅便是一个。

大部分学生是烈士子女和干部子弟，正是爱吵闹的年龄，他们之间，忽好忽吵，有时我还没起来便打上门来，互诉对方的不是。排解纠纷这类事，弄得我束手无策。刘子毅年长，我从心里依靠他为我分忧解难。当然，也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他。

我们的语文课没有教科书，靠自己选编。教课不久，我便发现学生们不喜欢枯燥的课文，倒喜欢唐诗；每讲唐诗，孩子们便争先恐后地奔入教室，有的带上小木凳，没有木凳便用砖头当座，膝上放块木板，木板上铺着马兰纸的小本，准备记录。

我选的多是唐代诗人忧国忧民，关心民间疾苦之作。孩子们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样的现实，既陌生又愤懑。求知欲鼓舞他们偏要寻根究底。所以当我从那些专注的、打着问号的目光间走出教室时，身后自然地跟着一群孩子，叽叽呱呱，问长问短。我的窑洞距教室很近，转过山坡便是，孩子们常到我的

住处。刘子毅来得较勤，他对课文的理解深于其他同学，同学们的提问，有时他比我解释得更确切。

刘子毅到我的窑洞来很随便，在无拘无束的闲谈中，我知道他父亲牺牲于上海，他就在流浪汉队伍中长大，当过童工，挨过资本家的鞭子。抗日战争后，周恩来同志在上海找到他，将他送来延安。他对继母很尊敬，他告诉我，继母当年在红军中可称得一名美人。母亲死后，父亲已经不年轻了，但因为父亲对党的忠诚和行动的果敢，却打动那位少女的心，坚决与父亲结为伴侣。所以在继母半身瘫痪时，总是他背着上山下山。他讲的许多故事，常常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劝他写成作文，他每次都写，也写得很快，可惜读来索然无味，不但别字连篇，上海土话更使人揣摩半天还摸不着头脑，所以要改，但也无从下笔。想教他怎样写，遗憾的是我也拿不出好办法，只有相视叹息而已。

万万想不到我们之间也会发生冲突。

有一天，一个同学来告他的状，我听后特别生气，顿时将他找来。他一进门，便感到气氛不对，于是昂起头，有点突出的眼睛，射出倨傲的光芒：“班主任，你找我？”

我的态度肯定生硬，话说得也不会好听，所以他还没有听完我的“训斥”，便爆发了愤怒的吼声：“你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克里空’^①的汇报！”

他的脸胀得通红，一副桀骜不驯的派头，就像当年对待压迫他的“老板”一样。我顿时全身战栗，伴随屈辱的是眼泪，他见我居然哭了，起初一愣，顷刻之间，惊愕变成嘲笑：“班主任，你也太小资产阶级情调了，这点小事也值得哭！”

我二话没说，一头冲出窑洞去找校长，我的全部意念都是：“不干了！不干了！”

校长宽慰我一番，当然，他不会让我走的。

① 克里空：前苏联作品《前线》中一个说假话的人物。

抗日战争胜利后，师生们各奔东西，我徒步到东北。这时候，蒋介石集团气焰嚣张，发誓要消灭共产党。敌强我弱，敌人步步紧逼，我所在机关被迫撤到佳木斯。国民党委派土匪为“反共救国军”，日夜骚扰，夜不能脱履。一个中午，刘子毅奇迹般出现在我面前。阳光的威力和劳累深深刻在他脸上，我还来不及问话，只见他性急地从身上掏出一只轮牌手枪交给我，说：“这次我和林汉南同志执行任务，火车开到牡丹江附近，忽与土匪遭遇，土匪包围了火车，我们猛冲出车厢，消灭了土匪，但不幸汉南牺牲了。这是我从土匪头身上缴来的枪，你留下防身吧。”

我无言对答，将枪紧紧抓住，抚摸……我不明白，当时我想从枪上寻找什么。

他告诉我，到东北之后，他便做公安工作，并向我倾诉了一段段神出鬼没的经历，豪情壮志，溢于言表。我庆幸他少年时的苦没有白吃，那些苦头终于变成财富了。

全国解放，我们没有直接来往，但从他的同事口中，仍然听到关于他的消息。“文革”期间，我和老伴先后身陷囹圄，母亲只得到上海去找妹妹。当时的首都处于空前浩劫之中，抄家、破“四旧”极为时髦。母亲深恐我的一部未完的文稿被毁，便将其随身携往上海。不料被上海的红卫兵搜获，一口咬定是档案，将我母亲扣留。我妹妹和妹夫焦急万分，走投无路，毕竟妹夫蒋祖林有见识，于绝望中豁然开朗，想起同学刘子毅。子毅这时正在上海火车站做保卫工作，日子也很不好过了，但得讯，仍不顾安危，挺身而出，四处奔走斡旋，使母亲得以脱险；我的文稿也避免了“灭顶之灾”。严冬过去，它终于重见天日，与读者见面。

我对子毅一直怀着感激与思念之情，极想探视在水火煎熬着的他，但终因自己的处境也与他相似，得不到那份自由。直到1968年他蒙冤惨逝，仍未谋一面。想起来，不仅遗憾，尤觉凄楚。

但闻延河流水声声唤

欧阳代娜

我们这群当年延安时代的中学生，已先后进入了花甲之年，近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仍历历在目。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延河母亲的呼唤声，总在耳边响起。

“勇敢些，沉着些，我相信你是会考取的！”

1944年冬的一个傍晚，父亲托人捎信给我，说延安大学预科要从绥德师范和米脂中学的学生中招生，用两年时间完成中学阶段的复习任务，然后转入延大本科。父亲鼓励我去考一考，并在信的末尾写上了一句颇有诗意的话语：“勇敢些，沉着些，我相信你会考取的！”

这个消息，叫我又惊喜又犹豫。延大自然科学学院是我向往的地方，可是考试就在明天，我毫无准备啊！怎么办？去不去？我问小伙伴们，大家七嘴八舌说开了。有人说：“去，反正是一次机会。”最后大家一致决定：“去，一定去！”不到10分钟，我们这群十三四岁的小同学就把决定生活道路的大问题解决了。当时，要一起报考的还有吴群（世益）、云泊娟、何理文、孙静兰。有人提醒我们：“快去做些准备吧！”

“准备什么？明天就考试了。”

“那就今晚早点睡觉，明天好有精神头！”

第二天，我们去自然科学学院报了名。一位姓刘的老师接待了我们，还进行了口试。

“你们几个小同学为什么要考理科的预科呢？”

“我们希望能学到建设新中国的本领!”

“你们几个是小学毕业生，人家都是中学毕业的，跟不上怎么办?”

“我们一定能跟上来!”

口试是简单而又严肃的。我们那时还无法描述未来的共和国的蓝图，但我们坚信胜利是会到来的；建设新中国的重任要由我们担当。我们毫不犹豫地报考了理科预科班。

口试之后，又作了笔试。共两张试卷：数学、自然、史地一张；语文一张。我打开试卷，想起了父亲的话“勇敢些！沉着些！”于是我满怀信心地交上了答卷。

过了几天，延大来通知，我们五个人都考取了。大家为我们祝贺。我们打起背包，带上简单的学习与生活用具，到延安大学去报到。

愉快的学习生活

1944年时的延大预科班附设在延大行政学院内，这里没有宽敞的教学楼，连一间平房教室都没有，全部的教室与宿舍都是同学们用自己的双手挖出来的窑洞，全校最大的房子是修在半山腰上的一间大礼堂。这里没有操场，最宽大的平地，就是半山腰上伙房前供大家吃饭用的一小块空地。教室里没有桌子，每个人的膝盖就是自己的书桌；没有椅子，每人发一把小马扎，走到哪里都可以上课；夏日山风和我们作伴，它轻轻拂去我们头上的汗珠；隆冬雪花跟我们戏嬉，她顽皮地遮挡住我们的视线，一节课后，同学们都变成了“白雪老人”，配合着周围一色银装素裹、延绵不断的山峦，犹如一个神奇的童话仙境。

我们学校的设备十分简陋，可是，我们学校的生活却是最充实的：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担任校长和老师。周扬同志是我们的校长，江隆基、张晓初同志是副校长，张如心、林迪声同志是教务长。王哲时和于修同志是我们预科的正副主任。著

名学者、教授于光远同志和何思敬同志给我们上课。执教的老师大多毕业于蒋管区名牌大学，他们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他们的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江天成老师的代数和物理讲得生动有趣，深入浅出，他是我们理科2班的班主任，他博学多才、思维敏捷，全班同学都十分敬佩他；几何和三角课教师王哲时同志不但会教书，还会开火车，他的课理论联系实际，通俗易懂；解放后成为我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荣孟源同志担任历史课；教化学的夏淑慧老师讲课清晰易懂，语言娓娓动听；向明老师的热情生动、富有抑扬顿挫的语言把地理课讲得生动有趣，引人入胜。上英语课没有教材，我们用的教材，都是教我们英语课的许老师自己编写的。他编的教材生动有趣，至今我还能背下不少章段。记得有一课书的第一句是：

“We live in an ocean of air.”（我们生活在空气的海洋里。）

他在课堂上总爱说：“Any questions?”（有什么问题吗？）他的耐心与认真的教学态度至今还在影响着我。我喜欢语文课，芦白老师的文学欣赏课，至今仍记忆犹新。我们曾在课堂上放声嘲笑过《藤野先生》一文中清朝留学生的丑态；大家曾被莫泊桑巧妙的情节安排所吸引，为人物的命运而哀叹。当时我们的物质生活是十分清贫的，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十分富有的。我们身居偏僻闭塞的黄土高原，但我们的视野却十分开阔。

我们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团结起来了。每晚我们都利用晚上熄灯号吹响前的片刻教唱歌。当时教唱的都是我国著名革命歌曲和苏联革命歌曲。

我们的歌声飞扬

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1945年在凯歌声中到来了。我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举行元旦联欢会。理科2班同学，集合在宿舍窑洞前的一条狭长的坪台前，头顶青天，脚踩高原，四周延绵不断的群山峰峦像大海的波涛紧紧地拥抱着我们。这是多

么壮观的礼堂！这里没有灯饰，没有彩旗，但满天飞舞的瑞雪，却给我们的兴致点缀得晶莹剔透，五彩缤纷。这里没有糖果，没有饮料，但戏嬉顽皮的雪花偶尔闯入我们的喉咙，使人感到分外甘甜！

四部合声的国际歌，以她特有的魅力震撼人心。熟悉的旋律，此时此刻更是有深沉的含义。“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我们不是在对别人做“救世主”式的召唤，而是用自己的心发出庄严的誓言。因为我们自己就曾经历过饥寒交迫的奴隶生活。“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这不但是理想，更是我们切身的实践，是几代人前仆后继，矢志不渝的实践，我们唱得自豪，唱得痛快！在歌声中，我们重温了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历经磨难挫折，屡遭困顿惘惑，但始终不改追求光明的心。因为我们坚信，我们“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的世界！”在悲壮高昂的音符中我们高声抒发出自己的信念：“英特那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我们深感到这句歌词的分量，深感到历史的重担已落到我们的身上。大家在心里默默地宣誓：要用自己一生的奋斗来实践这庄严的许诺。近50年来的经历，证明了我们大家是言行一致地恪守了这个誓言的。

“我们的歌声飞扬，作光荣号召！”是的，在那个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是以歌声作武器，唤起千百万人民同仇敌忾的勇气与决心。

狂欢之夜，愤怒之夜，忧忡之夜

1945年8月的来临，国际风云变幻，历史到了最伟大的转折关头。

在苏德战争结束3个月后，苏联红军按照雅尔塔协定的精神于8月5日对日军空战，并出兵进攻占据我国东北14年之久的日本关东军。中国的抗日战争迅速进入到最后的反攻阶段。国际上一连串的重大事件，令人目不暇接，人们的思维活动进入到一个

最活跃的时期。

8月6日，延安全体同学在大礼堂听张如心老师的形势报告，会场十分活跃，提问的小纸条源源不断地传向主席台，大家最关心的是“苏联参战后，日本关东军会不会负隅顽抗？”“中国的抗日战争什么时候可以取得最后的胜利？”人们预计这场战争还会打一年半载的，但谁也没有料到日本政府于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以她自己特有的方式展示其不可违逆的必然规律。

日本投降了！半夜，消息传来，全校立即沸腾起来，延安大学这座大山都活跃起来了！19个班系像19条支流，一齐涌向食堂前的平地上。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学校对面的山上的机关干部也兴奋地欢呼起来，我们山脚下的市府交际处的同志也在呼口号。整个延安都沸腾了！同学们举着火把上街游行，有的同学甚至举着蒸馒头的笼屉作火把，以致第二天要改善伙食吃馒头时，竟因无蒸笼而改吃面条。8年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这古老而又多难的民族终于在近百年来第一次在列强侵略者的面前站立起来了。

但是，抗日胜利的欢呼声还未逝去，战争的阴影又袭上心头：国民党反动派要下山“摘桃子”，日本军队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内战的危机步步紧逼，威胁着渴望和平的人们。我们的语文老师让我们做《我们在抗日胜利中得到了什么？》一篇命题作文。全班同学慷慨陈词，表述了自己对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的极大的愤慨。在课堂，在课外，在校内，在校外，人们到处都在议论着“战争”、“和平”这一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问题。我们已无法安静地在窑洞里学习了，同学们从白天争论到夜晚，又从夜晚讨论到天明，就这样也不知过了多少个彻夜难眠之夜！

紧接着是更为令人震惊的消息：“毛主席要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判！”

“这怎么能行？”

“去重庆，太危险了！”

“蒋介石可是天字第一号的政治大流氓啊，谁不知道他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阴谋家呀！”

“反正毛主席不能去。要谈，叫他蒋介石来嘛，我们保证以礼相待！”

“真没有想到，我们苦干3个月修的飞机场，却是要送毛主席去重庆呀！”

“那个美国特使赫尔利，他倒装得挺像的，中国人不再上他的当了。”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延安大学的夜晚，已失去往日的安谧。每个班组都在热烈而又不安的气氛中争论着一个共同的难题：“毛主席应不应该亲自去重庆？”焦虑、气愤、担忧，困扰着我们。

中央的决定很快下达了：“毛主席决定于8月28日赴重庆谈判！”大家从理论上弄懂了，但思想上仍不通；从组织上是服从了，但感情上却受不了。

8月28日上午，我们延大高中部同学和延安军民在机场，欢送毛主席乘机去重庆谈判。

毛主席的飞机昂首直穿云层，飞去了。我们的眼睛湿润了，我们的心也紧随着飞机远去了。

“到新解放区去！到前线去！”

1945年9月的延安南门外的新市场的大街上，热闹非凡，人流如潮。人们在欢送一批又一批的战友奔赴新开辟的解放区，奔赴斗争的最前线。昨夜，我们还在同屋讨论国家大事，今天，战友们已整装上路了。告别的方式既简单又豪迈。大都只有一句话：“前方见！过两天我就跟上去！”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期望着新中国的早日到来。

在欢送奔赴前方的队伍中，我看见了体弱多病的母亲（她在

一个月前还住在疗养院里)，我赶忙上去告别：

“妈妈，您要多注意身体！”

母亲笑着说：“你放心，有组织上关心，有同志们照顾，没问题。你们留在延安，要好好学习，听从组织安排。”

短短5分钟，我们话别后，母亲骑上牲口远去了，我也赶回了学校。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我们这些长期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人，很少考虑个人的需要与利益。大家想的是怎样才能为革命多做贡献，怎样为党多做工作。

我渴望上前线去，与同伴们并肩战斗。但是父亲接受了周恩来同志分配的任务，要去大后方蒋管区进行文艺统战工作。因工作需要，我们留下来了，我在延大高中部继续学习。

1946年5月11日，我16岁了，组织上批准了我的入党要求。当时，虽然没有举行隆重的入党仪式，但在我心中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要一生都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

1946年5月16日，组织上调我去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工作。我二话没说，第二天，打起背包就去报到了。

我的中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延河流水日夜不停，喝延河水长大的儿女和母亲的心一脉相通，我们会牢记母亲的期望与叮咛！

情系黄土地

李 伦

1941年1月，我随父母从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经重庆撤回延安，入自然科学学院学习。

刚到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请我们一家人吃饭。我既紧张又高兴，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朱老总。毛主席身材高大，面容慈祥，穿着灰土布衣裤，膝盖上打了补丁。吃饭就在毛主席会客的窑洞里。窑洞中间放着一张制作粗糙的方桌，四周是长凳子。靠墙有一个“长沙发”，是从报废的卡车上拆下来的驾驶员坐椅，底下用木头支着，靠背用墙撑着。吃饭时，菜都是用搪瓷饭盒装的，饭盒上的搪瓷掉了不少，显得很破旧。我到延安后的第一个深刻印象，就是毛主席在生活上十分朴素。

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封锁，企图把边区的党政军民困死、饿死。边区只有10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经济落后，粮食、物资极为匮乏，要养活党政军机关、院校和众多部队确实是困难重重。毛主席后来谈到这段生活时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为了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毛主席号召整个解放区的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我们自然科学学院的全体师生也投入到大生产的洪流中。

^① 《毛泽东选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那会儿，我们只有十四五岁，算半劳力，分配给我们的任务是纺纱线。女孩子心细学得快，我们这些粗手笨脚的小伙子可犯愁了，望着那白绒绒的棉花卷直发呆。我们潜心模仿“师傅”的样子，转起了纺车。明明和他们的动作一样，可就是纺不好，手指捏紧了，线断了；放松了，线粗了，总是纺不匀。别人顺顺溜溜地把那空心棉卷纺成了均匀结实的白线，一天能纺三四两，而我呢，吱吱扭扭一天只能纺二三两，还累得腰酸背疼，后来我也渐渐摸到了门道，掌握了要领，缕缕白线居然也从我手下纺出来了，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就这么着，我们这些十几岁的男娃都成了“纺织郎”。

我们纺完线交给延安织布厂织成布，再交给被服厂做成衣服。扣子是我们自然科学院实习工厂用铜铸成的。穿上用自己纺的线做的衣服，那舒服劲儿难以用语言表达。可惜的是，每人一年只发一套，没有换洗的，而且不结实。穿脏了，要等晴天到河边洗了，晒干，再穿上；扣子丢了，买不起，找条绳子往腰里一扎完事；衣服破了，找块旧布歪歪扭扭补上再穿。那时在延安穿补丁衣服是很“时髦”的。有些人甚至新衣服也要找块布在膝盖和屁股处补上几块，既结实，又时兴。当时延安种的棉花有限，一个时期，棉衣和棉被里的棉花用羊毛代替。羊毛总往布外钻，弄得羊毛到处飞，甚至连饭菜里也有毛。

为了解决大家穿鞋问题，学校让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外出拣破布。不知为啥单单选中了我，也许是因为咱纺线技术不高才被“另行分配”的吧。好在大家都有分工，有纺线的、纳鞋底、做鞋帮的、种菜的……人贵有自知之明，拣就拣吧！于是我们每天吃完早饭，就背上筐儿，到各处的垃圾堆去拣破布。开始总觉得不好意思，但完成任务要紧，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那年月，谁都省吃俭用，布头自然不容易拣到。我们专找垃圾多的地方，哪里脏就去哪里，见到垃圾堆就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用棍子挑、用手扒，拣到一块大点儿的破布特别高

兴。为了捡得多，有时候一天要走几十里山路。回来后把布头拿到河沟里漂洗干净，在石头上，草地上晒干。每当背着“战利品”回来，想到大家鞋底上也有我一份劳动，心里美滋滋的，就越发爱上了拣破烂这一行。除完成本职工作外，我还抽空跟着学纳鞋底。

参加大生产，虽然累点苦点，但我们得到了锻炼，知道了吃饭穿衣来之不易，增强了劳动观念，体会了工人农民的艰辛，加深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亲身感受到劳动创造世界，创造幸福的真理，更加体会到革命的艰苦和伟大。

那时候，我们年纪轻，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干活冲，吃饭也冲。每天还没到开饭的时候，肚子里就打鼓。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3钱油、3钱盐、^①1斤半小米。菜靠自己生产，数量很少，食堂只能做汤菜——一大锅水煮菜放些油盐，很少吃炒菜。小米饭泡汤菜，吃得也蛮香。有一段时间小米没有了，成天吃老百姓用来喂牲口的煮黑豆，难吃难咽，又不好消化。

大生产以后，生活有了改善，一周可以吃一次馒头，一个月可以吃一次肉，春节可以吃到一顿大米饭，还能经常吃到炒菜。有些家在延安的同学，从家里带点羊油和牛骨髓油，很快就被大家“共产”了。羊油、牛油拌小米饭，简直就是“会餐”。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我们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为我们的饭菜起了许多动听的名子；汤里放几根葱叫“青龙过海”；小米饭加胡萝卜丁叫“沙里淘金”；小米饭加白萝卜丁叫“金银饭”……当时我们大家最爱吃的，是当今最流行的“营养丰富、余味深长”的“小米锅巴”。不过那时的锅巴是地地道道、纯纯粹粹的小米饭下边那层黑乎乎的厚锅巴，每次吃过饭大家都希望分点锅巴拿回宿舍当“点心”。秋天到了，我们上山去采酸枣。那一颗颗红红的、圆圆的小果实，最招女孩子欢喜。山上的甘草根也是我们

^① 旧式秤，1斤是16两，1两是10钱。